

中国的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

罗志恒 原野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我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和财富分化也在拉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凸显,基尼系数在全球看仍处较高水平。贫富分化过大,不仅不利于贯彻落实创新、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不利于提振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四个阶段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分析了不同阶段的贫富分化程度、特征和原因,提出了我国未来可能的政策发力点。

关键词: 贫富分化 ;共同富裕 ;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出发展的逻辑在发生变化,即越发侧重发展的安全性和发展的公平分配,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阻断贫富分化的代际传递。但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和财富分化也在拉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突出,基尼系数在全球看仍处较高水平。贫富分化不仅不利于贯彻落实创新、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时,不利于提振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更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四个阶段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分析了不同阶段的贫富分化程度、特征和原因,提出我国未来可能的政策发力点。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期盼,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近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已印发公布。此外,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治理学区房、整顿校外培训、教育“双减”政策等一系列事件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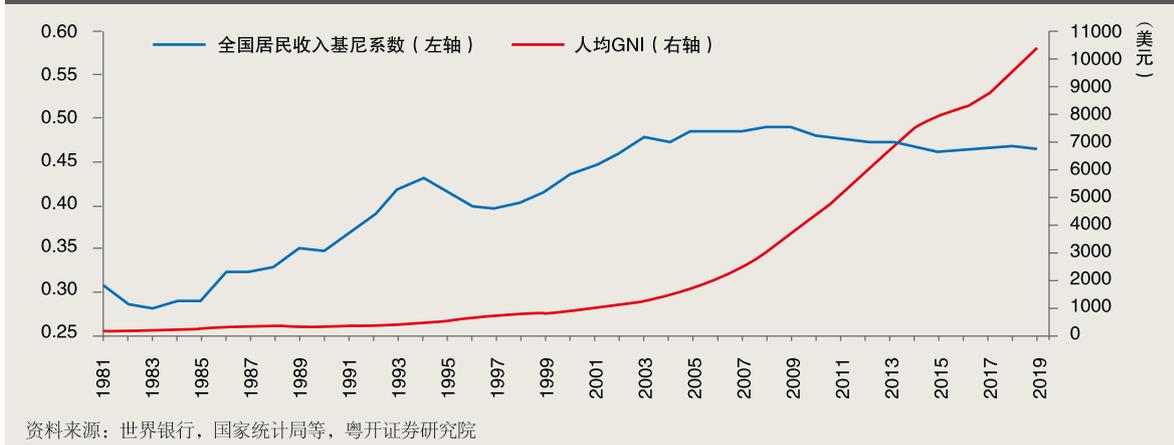
一、我国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的现状和问题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势较为严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收入分配理念从绝对平均主义转向先富带动后富,并最终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意味着要素禀赋的差异一定会带来收入差异。当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密切捆绑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没有跟

作者简介: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原野,粤开证券宏观研究员。

图1 伴随着经济增长基尼系数也大致呈上升趋势



上时，高收入意味着更优质教育、医疗、住房，从贫富分化演化为人力资本投资分化，容易发生阶层固化。一定的差异有利于激发个体的积极性，但是差异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反而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 纵向看，伴随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2008年后有所下降，但近年来仍在高位徘徊

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317，2019年上升至0.465，这期间于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整体仍处在警戒线以上的高位区间。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和中位数的比值来看，2014年以来该比例持续上升，反映出我国收入结构右偏，贫富分化程度较大（见图1、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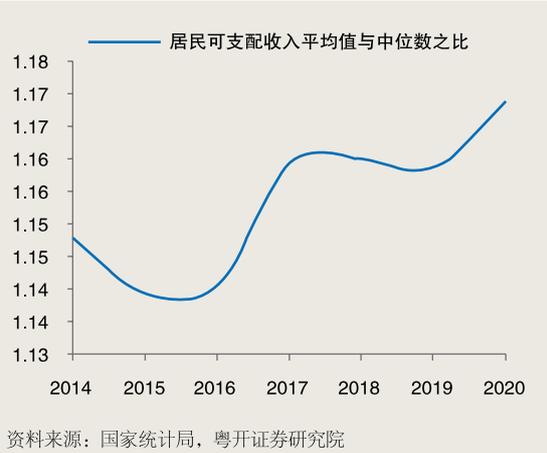
2. 横向看，我国属于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基尼系数更新至2016年，当年有数据的81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均值为0.362，而我国为0.385，较均值高出6.27%，主要经济体中仅美国、巴西等少数国家比我国排名靠前（见图3）。若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参考，我国当年基尼系数为0.465，较其余80个经济体均值高出约30%。

3. 结构上，我国分配格局呈现出城乡差距显著、区域发展不均、财富差距扩大的特征

一是我国二元经济的壁垒始终存在，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经济现象，且1978年以来城乡差距一直是全国收入差距中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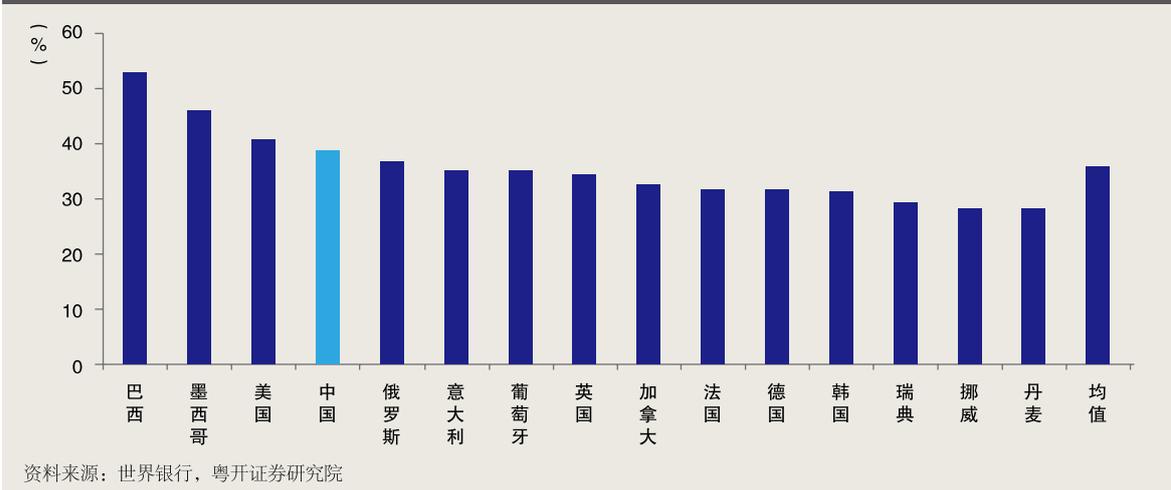
图2 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中位数上升



的贡献因素。尽管21世纪以来，在一系列惠农政策、扶贫政策的作用下，城乡差距有了显著缩小，但仍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万元，而农村居民仅为1.71万元，城乡收入比为2.56倍。国际上，发达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的城乡收入比约为1，发展中国家印度相关指标约为1.9，低收入国家如乌干达的城乡收入比为2.3左右。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区域间收入差距较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对东部的政策倾斜导致东部地区吸引更多资本，发展更快。同时，东部的比较优势是资本，西部是资源。资本更多是市场化定价，而资源价格受到行政管制，客观上造成西部资源供给省份补贴东部资源需求省份的格局。上述因素造成了区域间的收入分化。2020年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

图3 多国2016年基尼系数



收入为 4.12 万元，是西部地区的 1.62 倍。

三是财富分化的速度较快。财富分化加剧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财富分化又会进一步加速收入分化。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财富分化程度还比较小，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证券、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财富分化程度有所扩大。

（二）贫富分化不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显著，不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更成为实现远景目标的桎梏。

一是贫富分化与“共享”相违，制约创新，不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方面，贫富分化意味着经济发展成果被一部分人或者少部分人享有，而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人人享有、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要求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但贫富差距扩大降低了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随着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收入结构趋向于两极化，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此外，贫富分化使得财富更多流向大型企业和企业家，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由于中小企业贡献了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对创新主体的发展前景造成影响。

二是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尤其是提振消费，但贫富分化抑制消费。当前，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主要经济体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

特征凸显，发展的安全性越来越重要，有必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模式，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然而，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拉大，导致中低收入群体消费不足，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较低，不利于消费扩张和升级，进而影响内需的扩大。近几十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始终保持平稳增长，但居民最终消费率仍明显偏低，均不足 50%，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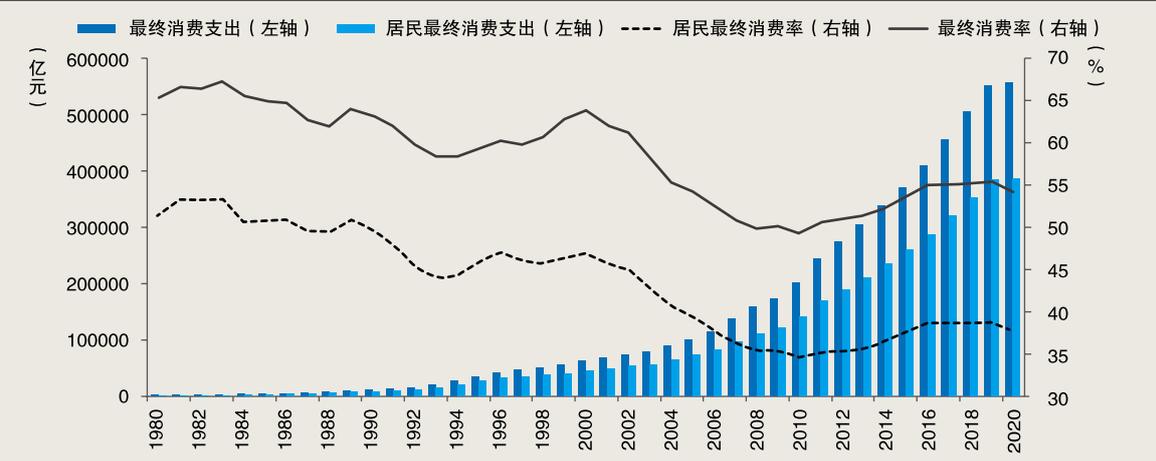
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有赖于社会的稳定，而贫富分化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我国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往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低收入人群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未来我国经济增速的中枢不断下移，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变得更不确定，如果贫富分化加剧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稳定的基础将面临威胁。

由此可见，缩小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能否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意味着必须将促进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我国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的历史演变和背后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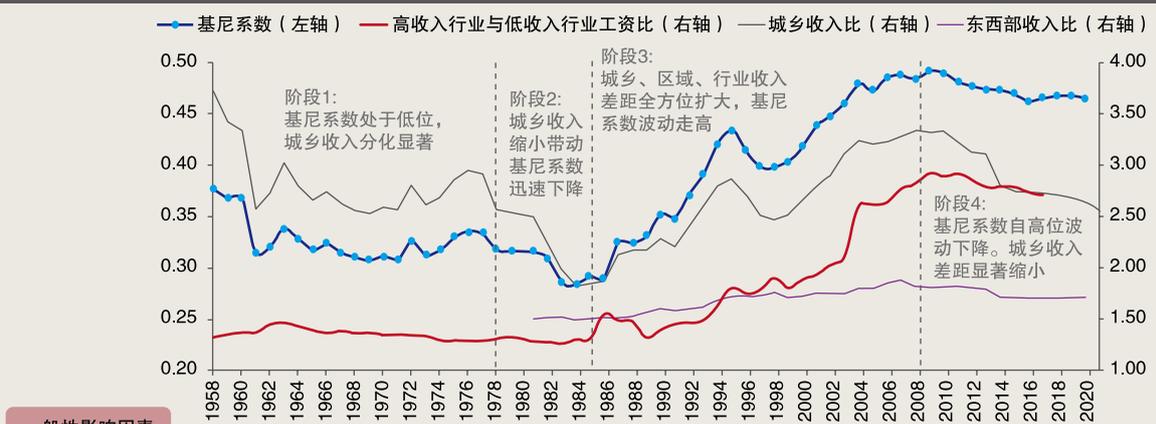
贫富分化问题是由多个因素相互交织形成的，要素相对稀缺性、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财税政策等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因素。然而，从我国的历史实践看，由于独特的政

图4 我国居民消费不足仍明显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5 我国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的历史演变和背后机理



一般性影响因素			
1. 经济发展转型的一般规律 2. 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因素 3. 危机、战争等外生冲击 1. 低实际利率 2. 财税政策 3. 劳动力市场制度	1. 重工业偏向型战略 2. 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人民公社、工资受到行政化手段控制） 3. 限制农民流动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 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	1. 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工业化转型、市场经济转型、所有制转型） 2. 要素市场的制度性约束导致要素价格扭曲（户籍、土地） 3. 东部偏向型战略的路径依赖 4. 全球化
	牺牲效率的公平		1. 激励机制扭曲导致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异化 2. 税制不合理 3. 金融市场不完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注：1.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行业工资比是指收入排名前三行业的人均工资与收入排名后三行业的人均工资之比。
 2.城乡收入比中2013年前的数据是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纯收入得来。
 3.东西部收入比是以各省数据为基础通过人口加权计算得出，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湘8个省市/自治区，西部包括蒙、桂、渝、川、黔、云、藏、陕、甘、青、宁、疆12个省市/自治区。
 4.1952-1978年基尼系数采用ADELMAN等估算数据，1979-2002年基尼系数采用李实等估算数据，2003至今的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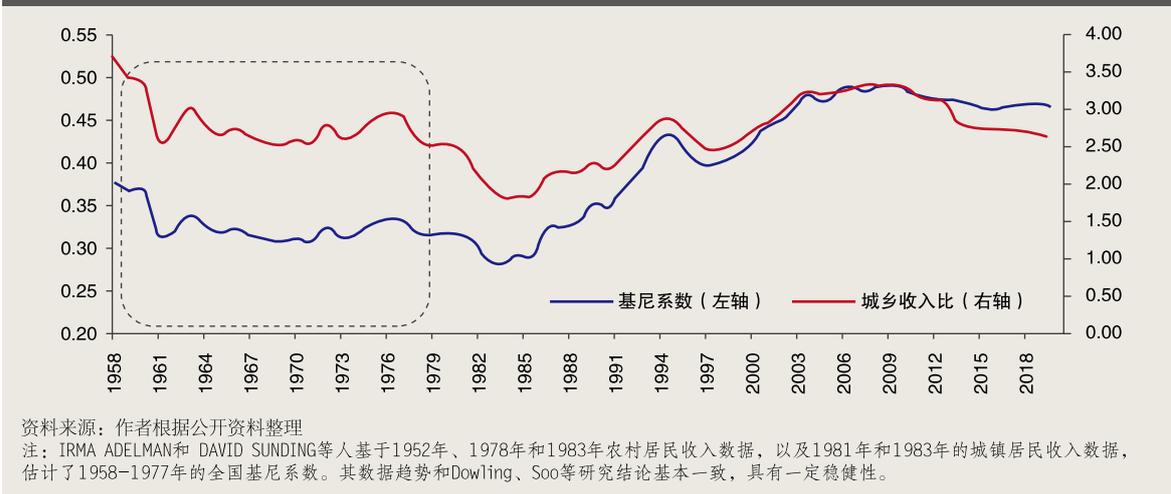
治体制、特殊的历史背景、多变的国际环境，造成贫富分化的成因更为复杂，表现形式也更多样。鉴于此，根据我国收入差距的表现形式，本文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划分为4个历史阶段，并进一步分析了导致不同阶段分配格局的主要原因（见图5）。

（一）建国初期至1978年：低水平的绝对平均

1. 该阶段特征为基尼系数先升后降，整体处在低位区间，但城乡收入差距显著

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阶段，基尼系数有所上升。

图6 1952—1978年基尼系数整体处在低位，但城乡差距较为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格局基本上是旧中国的延续，在土地改革运动后，地主阶级对土地资源的垄断基本被打破，整体分配格局呈现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均，1952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255。但当时百业待兴，高度平等的背后是人均的贫穷。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工业生产、国民收入都有了较大提升，但重工业战略导向客观上拉大了收入分化，1958年基尼系数上升至0.377。

二是随着计划经济的深入，尤其是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内工资的严格控制，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急剧下降。1965年全国基尼系数降低为0.318，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317（见图6）。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始终处于高位，但农村内、城市内收入分化不大。1952年，农村内、城市内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230和0.165；1978年，相应数据为0.222和0.165，变化较小，但城乡收入比在1958至1978年间平均值为2.82倍。

2. 成因分析

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工业导向特征造成农业和工业部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第一个五年计划带有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特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旨在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快速积累资本实现工业产值的高增长。这种模式建立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控制内部贸易条件来促进农业部门高比例的非自愿储蓄，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工业投资。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

21%，比1952年增长128.5%，但相伴而生的是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持续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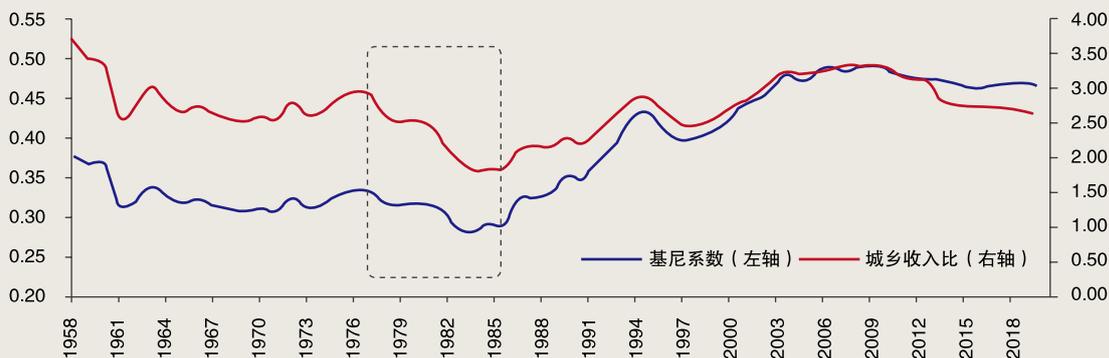
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使得农村内部、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维持低位。一是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1957年前后，我国出现粮食短缺的局面，顶层设计开始更加关注农业生产。195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发布，我国进入了长达26年的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沿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农民”链条进行管理，农民以生产队为基本单元共同劳动，生产队生产总量扣除上交国家的部分，根据农户一年的工分进行分派。二是在城市实行全面公有经济。不仅劳动力的就业和工作岗位由政府安排和配置，工资也受到行政化手段控制。城市内工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人工资系列，一类是干部工资系列。工人工资系列分为8个级别，级别内差距很小。1952—1978年间，各个行业的人均工资非常接近。

三是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导致城乡差距始终较大。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其后，中央内务部、劳动部发文重申贯彻该指示，可见，限制和控制农民的流动是当时的政策主张。到了公社时代，政府通过户籍、粮本等方式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徙，一定程度上导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始终较大。

3. 历史评析：计划经济体制下较小的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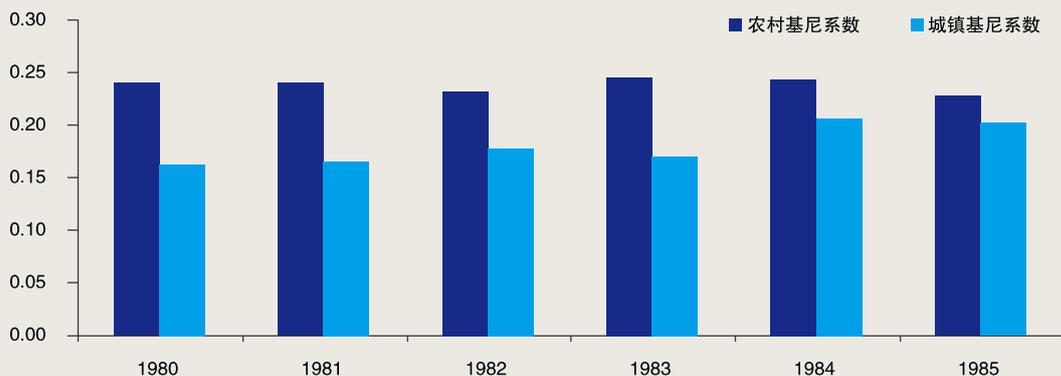
一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缺乏激励作用，按劳

图7 1978—1985年基尼系数随城乡收入比下降而减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8 农村与城市基尼系数波动幅度小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粤开证券研究院

分配基本原则得不到贯彻执行，实际上对劳动贡献大、个人禀赋高的劳动者不公平。一定程度上滋生了负面的社会价值导向，否定了努力、教育的意义。

二是居民没有同步分享到发展的成果。1952—197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7%，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不足2%，即使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收入增速也显著低于经济增速3~4个百分点。

（二）1978—1985年：城乡差距急剧缩小带动基尼系数下降

1. 阶段特征：城乡收入快速缩小，带动基尼系数进一步下降

一是城乡收入快速缩小，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倍下降至1983年的1.82倍，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差距最低水平的时期。之后城乡收入比小幅上升，1985年也仅为1.86倍，

较1978年下降了约30%。

二是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尼系数也急剧下降。这一时期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保持了高度一致，从1978年的0.317下降至1985年的0.29，降低0.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并没有大幅波动，意味着基尼系数的下降主要由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导致（见图7、图8）。

2. 成因分析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导致农民收入较快提升，缩小了收入差距。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实现了农民决策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统一，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配置效率，增加了农产品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允许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活动，不但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也扩大了农民的收入来源。相对于农村改革而言，城镇改

图9 基尼系数走高，城乡、行业收入差距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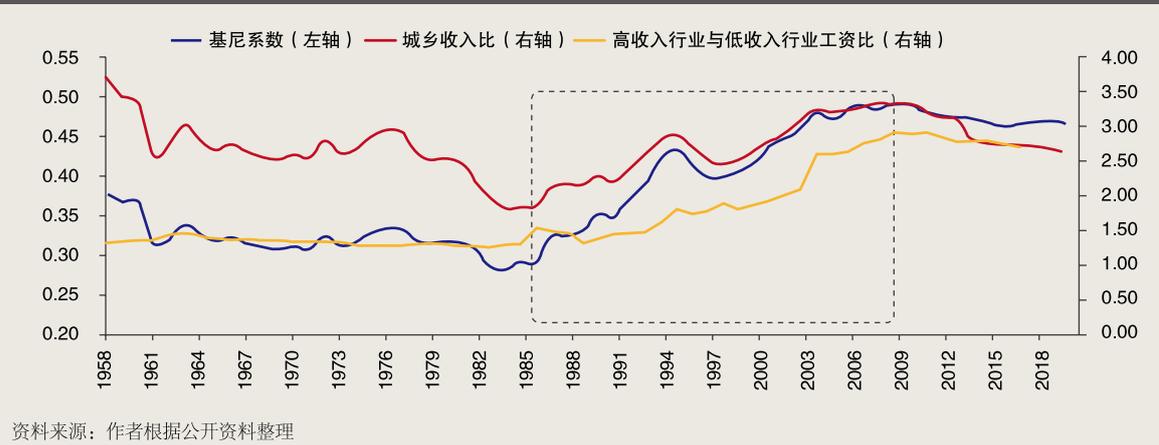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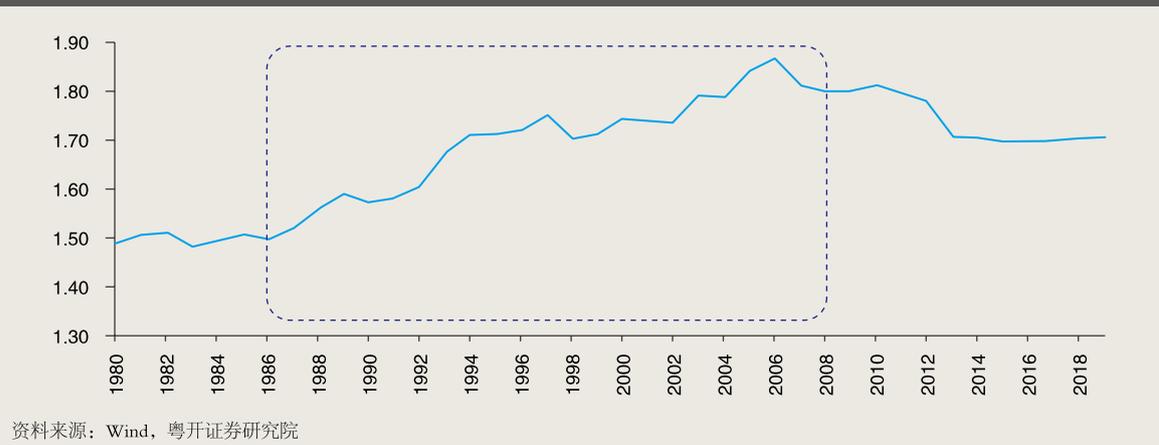


图10 东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革起步较晚，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据统计，1978—1984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6.48%，而城镇居民为8.12%。

二是政府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带来农民收入短期内大幅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1979—1981年，农产品价格分别提高了22%、7%和6%，三年累计提高近40%。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直接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降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3. 历史评析：改善农民的生活可以有效减小贫富分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统一经营向分户经营转变，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收入，进而促使收入差距缩小。总体来看，1978—1985年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时期。

(三) 1985—2008年：城乡、区域、行业差距全方位扩大，全国基尼系数快速上升

1. 阶段特征：全国基尼系数呈快速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一是基尼系数迅速上升，从1985年的0.290上升至2008年的0.491，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

二是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全方位扩大。城乡收入比从1985年的1.86倍上升至2008年的3.31倍。不同于前两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农村内、城市内收入差距也在同时扩大，例如，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227上升至0.378。

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分化加剧。2008年收入排名前三行业（金融业、信息互联网行业和科学技术服务业）的平均工资约是排名后三行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和农业）的3倍，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

后期的 1.54 倍。

四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也在增加，但变动幅度较温和，东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部居民之比从 1.5 倍上升到约 2 倍（见图 9、图 10）。

2. 成因分析

一是产业、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一，工业化转型扩大了资本积累，加剧了收入分化程度。工业化转型初期，劳动力相对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较高，客观上导致资本所有者比劳动力提供者获得更多收入，且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两者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例如，1985—1995 年，伴随着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内部基尼系数也从 0.227 升至 0.342。第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收入分配模式转变，扩大了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决定机制由计划统一的模式转向独立分散的模式，即企业根据劳动者的能力、贡献等因素决定其薪酬。这种市场化的分配机制客观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第三，所有制结构转型过程引发收入差距的扩大。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城市内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大批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失业，同时，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在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后，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在石油、通讯、电力、金融等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居于垄断地位，进而导致相关行业国有企业工资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1995—2000 年，城市内居民的基尼系数从 0.293 上升至 0.323。

二是土地、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制度性约束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加剧了收入分化，尤其是城乡间的收入分化。第一，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无法获得与户籍挂钩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增加其生活成本，降低了实际收入水平。同时，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也更愿意雇佣本地居民，这又带来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此外，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第二，土地转让制度对农村土地价格的扭曲。与城镇居民不同，农民对宅基地只拥有使用权，所以农民住宅的出租、出售和抵押受限。导致农民土地无法自由流转，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拉大了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异。此外，

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方式的简单粗暴，致使农民处于劣势地位。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征用土地，农地转非农用地过程中，出现了农民无法获得合理征地补偿的现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三是改革初期的东部偏向型策略导致资本在区域间配置不均，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一，东部偏向型策略导致东部率先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资本在区域之间的配置和流动是造成区域间收入分化的关键因素，东部率先开始对外开放，一系列政策优惠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带动东部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东部的投资率显著高于西部，主要源于外资贡献。第二，东部偏向型策略导致投资形成路径依赖，即初期的外商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外资的引进完善了配套基础设施，优化了营商环境，提高了东部地区投资回报率，反过来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即便外资优惠政策转向西部，也很难改变投资回报率的区域间差异。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开始向西部倾斜，大量财政转移支付流向西部。2000 年，西部投资率超过东部，达到 35.37%。但从规模上看，西部的投资规模始终低于东部，到 2008 年也仅为东部的 40.97%。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投资的路径依赖性，也说明市场主导的资金始终集中在东部。研究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外资的 85% 以上都集中在东部地区，按照汇率折算，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东部地区吸收的外资每年超过 3000 亿元，相当于东部地区 GDP 的 5%~8%。

四是在 GDP 目标考核和分税制的制度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政策重经济建设轻民生、重资本轻劳动，加剧了收入分化程度。在分税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政策执行的代理方，也有其自身利益诉求。由于我国长期施行 GDP 目标考核机制，受此激励，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去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并从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展开竞争。第一，财政支出结构重经济建设轻民生。由于基建相关的经济建设支出可以直接增加当期 GDP，还可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资本进入（尤其是外资），因此，地方财政支出更倾向于经济建设支出，导致教育、健康等方面支出不足，降低了中低收入

群体提升收入的能力。第二，财政收入重资本轻劳动，对资本友好。为了吸引资本，地方政府展开恶性的税收竞争以及高额的财政补贴，直接导致资本获得高于劳动的边际报酬。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收入分化程度不断加深。此外，由于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投资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这就导致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基建相关支出，提高对资本的补贴，进而形成负反馈循环。

五是税收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第一，间接税占比高，其累退性的特点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占比太低。一般情况下，间接税的税收负担更多转嫁给了消费者，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导致其整体呈现累退性的特点。而具有累进性的直接税在我国占比小，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21世纪初期，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合计占比约为20%，而增值税和营业税合计占比接近60%，营改增后占比仍达到约40%。第二，缺乏调节财富代际转移的遗产税、赠与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遗产税和赠与税来促进代际财产公平，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通过将遗产税与社会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结合，引导高收入群体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捐赠活动，利用三次分配强化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功能。第三，所得税对劳动调节有余而对资本调节较少。工薪收入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达45%，但财产转让和资本利得的边际税率仅为20%。第四，消费税改革滞后。一方面，新的高消费商品和高消费行为没有被纳入征收范围；另一方面，原有课税范围没有与消费升级联动，导致原来的高档消费品已经变成生活必需品却仍被课征税费。第五，房地产税未能开征，导致财富差距拉大。第六，农业税取消前对农民的征税扩大了该阶段城乡及农民内部的收入分化。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农业税和交费不是按照收入水平，而是根据家庭人口或承包土地的数量进行征收，类似于人头税。其结果是，虽然不同农户人均收入水平不同，但是人均税费却是相同的。这意味着高收入农户的税费占其收入比重较低，低收入农户则相反，因此税收是累退性的，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化。

根据1995年农村居民承担的税费负担数据，收入越低的农户缴纳税费率越高，其中，收入最低的10%农户的税率为13.7%，而最高的10%农户只有2.8%。

六是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不同收入群体可获得信贷资源不同，进而拉大了收入差距。第一，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更愿意将资金贷给资产质量好、抵押担保价值高的企业和高收入人群，使其可获取低成本资金并通过扩大再投资等方式实现财富增值。相比之下，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等则由于缺乏抵押物和有效担保等问题，面临较大的信贷约束。第二，我国长期面临利率双轨制的问题。直到2019年开始实行LPR，2021年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利率双轨制期间大部分低息贷款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

七是全球化的深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深入，国内和国际市场接轨步伐加快，商品、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与全球化联系更紧密的信息技术、金融行业的劳动者收入普遍上升较快，拉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3. 历史评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在此背景下，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合理的。事实上除了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外，我国贫富分化的加剧部分是由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所致。

(四) 2008年至今：城乡、行业差距缩小，全国基尼系数自高位缓慢下降

1. 阶段特征：基尼系数自高位震荡下行，城乡差距缩小贡献较大，但财富分化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一是基尼系数缓慢下降，从2008年0.491下降至2019年0.465，整体仍位于0.4的警戒线以上。

二是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从2009年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城镇居民，尤其是2010—2014年间，农村居民收入显著高于城镇增速。受此

图11 基尼系数自高位震荡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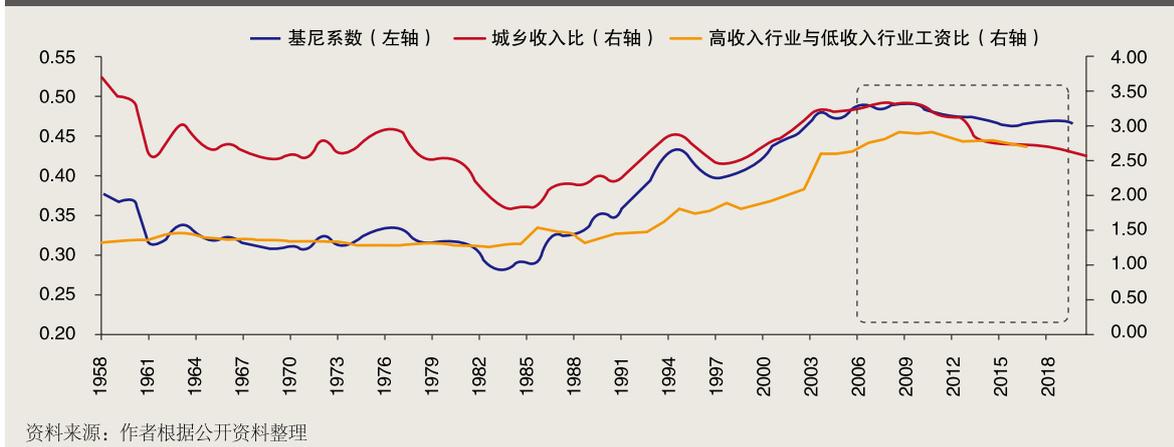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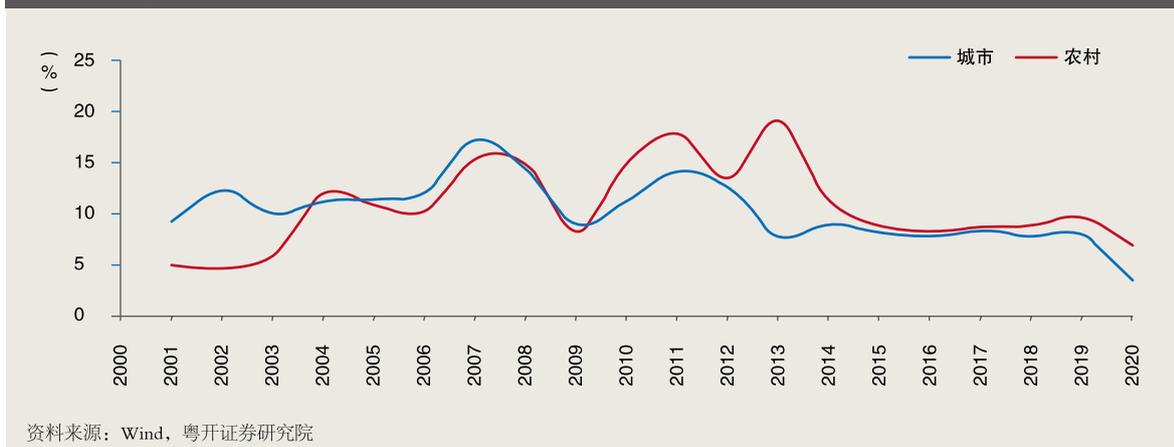


图12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



影响，城乡收入比从3.31倍下降至2.56倍，降低了约30%（见图11、图12）。

2. 成因分析

一是惠农、扶贫政策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第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推广、完善。2009年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对于缓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发挥了一定作用。同年，政府开始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参保农民报销部分医疗费，降低了农民因病致贫的风险。这些政策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有力提高了农民福利，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起到一定作用。第二，综合性扶贫政策不断发力。2007年以前，我国主要采取开发式扶贫战略，即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来改善贫困情况。2007年以后，救济式扶贫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例如，农村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获得低保救济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多。2007—

2013年是农村低保快速发展时期，享有低保的人数增加了51%。而这一时期的农村人口减少了12%。“十三五”规划期间，脱贫攻坚进入决胜期，为此政府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例如，2016—2020年，我国连续五年每年新增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0亿元，2020年达1461亿元。此外，前期一些改善农民收入的政策，在这一阶段依然对收入差距缩小发挥作用。例如，2007年以前实施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等补贴政策，以及2003年实施的税费改革。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短缺导致收入提高，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缩小。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一个直观的证据就是2007年之后，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不时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季节性（例如，春节后）招工



难问题日益凸显。这就导致农民工工资大幅上升，2010—2013年，农民工工资增长率都超过15%，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3~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于农民工生活保障的政策减轻了户籍制度的不利影响，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有所扩大。2008年以来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两方面因素作用下，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弥合城乡收入的差距，减少了贫富差距。

2008年以来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因素发挥了作用，遏制了收入分化加剧的势头，导致基尼系数缓慢下降。但基尼系数仍然处在较高位，一些扩大收入分化的因素仍起重要作用。

一是财富分化急剧扩大。财富分化对收入分化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随着财富存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财富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计划经济时期，财富存量少，财富分化程度也小。20世纪90年代，财富分化程度有所加剧，但低于收入分化的程度，再加上财富积累少，这一影响并不显著。2009年后，财富积累开始加速，2019年人均财富较2009年增长了2.39倍，而这一期间财富分化程度始终高于收入分化的程度，财富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723，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72。

二是房价上涨。第一，房价上涨导致财富增值迅速。较无房家庭而言，拥有较多房产的家庭财富增值速度快，进而导致财富分化加剧。在此基础上，

拥有较多房产的家庭还可以获得更多抵押贷款用于投资，进一步加大了与无房产家庭的收入差距。第二，房价上涨拉大了城乡差距。农村宅基地不能在市场上交易流转，而城市住宅可以自由转让，因此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速快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速。第三，不同区域房价涨幅不同，导致区域差距扩大。2019年，中国百城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5465.17元，较2011年上涨53.69%，其中，一线城市房产价格与价格增幅都远超二线城市。

3. 历史评析

2008至今，收入分配格局从效率优先逐步向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方向发展。

随着更多人意识到贫富差距带来的严峻挑战，一系列政策出台改善了收入分配格局。但由于制度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扩大收入分化的因素仍将持续产生影响（例如，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短期内基尼系数依然会维持在高位。

三、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政策展望及建议

过去导致贫富分化的部分因素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格局导致土地、财税等政策和制度长期优待资本、歧视劳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

① 数据来自2010—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表1 “共同富裕”出现的频率提升

事件节点	表述
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表述
“十四五”规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21年1月11日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2021年1月28日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2021年2月25日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2021年4月政治局会议	促进国内需求加快恢复，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
2021年6月10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2021年7月1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021年7月19日	浙江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其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形成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资料来源：根据新闻资料整理，粤开证券研究院

速、生育率下行，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缺。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会自发弥合收入差距。

同时需要在意，不合理的户籍、土地、财税、金融等制度设计跨越多个历史时期，持续扩大着收入差距，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因素，亟待改革以促进共同富裕。近期“共同富裕”在我国中央会议精神中出现的频率提高，体现了中央改善分配格局的决心，同时具体的政策路径也逐渐清晰化（见表1）。

鉴于城乡、行业和区域差距是收入和财富分配分化的主要领域，未来政策有必要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统筹发展，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改革户籍、土地和住房制度；从对资本友好转向对劳动友好，改革财税制度；从大型企业偏好转向普惠包容，改革金融制度，推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财税制度、金融市场改革，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以乡村振兴和都市圈城市群为城乡统筹的两个抓手，推动财政、国资和社保联动改革，在划定粮食安全、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三条底线的前提下，大胆推动人口、土地、资本的城乡自由流动

1. 推动财政、社保和土地联动改革，完善城乡土地流转机制，激活农村土地市场，发展都市圈、城市群

农村土地入市以及城市资本下乡有利于增加农

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然而，当前土地还承载着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的功能，为顺利推动土地改革，必须先提高农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水平，以社会保障体系替代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为土地流转改革创造好的前提条件。这需要推动财政改革，因此土地改革必须与财政、社保改革联动，否则单兵突进阻力太大，且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农民进城后，要更好建设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好城市群。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要加大建设用地供应，稳定大城市的房价，进而降低城市的产业成本，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打破劳动力流动的的制度约束，除特大城市外逐步取消户籍限制，渐进推动社保实现省级统筹到全国统筹进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目前，农民工市民化仍有待继续推进。建议尽快解决医疗、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加速户籍制度改革进程，降低落户门槛，降低城市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的绑定程度，破除城乡分割，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推动资本流动，改善农村投资及营商环境，政策引领推动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产业兴旺

需着力改善农村投资环境，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建立农村风险补偿机制、完善农业项目的退出机制等政策，解决资本下乡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吸引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及

积极性。

(二) 完善财税制度, 发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鼓励慈善捐赠等三次分配

1. 尽快开征房地产税, 研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一方面, 加快推进房产税立法, 研究对非经营用居民住宅开征房产税, 限制高收入群体财富过快积累; 另一方面, 开启遗产税、赠与税制度的论证与设计, 防范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

2. 建立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税制, 通过宽税基、低税率做大纳税人规模, 设置差异化的税率, 鼓励科技创新, 抑制娱乐行业畸高收入

第一, 逐步从当前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转为全面综合征收, 尤其要避免继续歧视劳动、优待资本的税制设计。第二, 个税的改革方向不在于提高免征额, 而在于做大个税纳税人规模。目前, 纳税人群规模太小, 难以发挥出个税调节作用。第三, 设置差异化的税率, 对于高科技领域收入实行免税或者低税率, 对于娱乐明星的高收入加强征管并设置高税率, 引导社会的正向风气, 崇尚科技和劳动, 抑制娱乐奢靡之风。加强对网红、直播带货等新型个人收入所得的征收管理, 拓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范围。

3. 改革完善消费税

重点取消原征收范围中已经成为居民日常消费品的税目, 增加对新增奢侈品和高消费行为(例如, 私人飞机、高级会所等)的征税。

(三) 深化金融制度改革, 发展直接融资, 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

1.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一直较低, 按存量法计算平均维持在 30% ~ 40% 左右, 而发达国家则高于 50%, 美国一直处于 80% 左右的水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不同, 间接融资是一个奖励过去的模式, 更看重稳定和规模, 因此, 它更倾向于为大企业、高收入群体提供信贷; 而直接融资是一个鼓励未来的模式, 更看重潜力和增长, 因此, 更倾向于为小企业、低收入群体提供融资。提高直接融资规

模, 客观上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更主动地向小微企业倾斜, 进而有助于缩小贫富分化。

2. 深化注册制改革

一方面, 完善退市机制, 发挥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 另一方面,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防止少数群体利用财务造假、内部操纵等手段, 借上市之名行圈钱之实。

3. 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

应当大力发展专注普惠金融和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一方面, 为中低收入阶层获得金融服务提供便捷、公平的渠道; 另一方面, 拓宽中低收入阶层的投资渠道, 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资本要素拥有额, 进而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 刘晓光、刘元春、申广军. 杠杆率的收入分配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2): 42-60
 [2] 王小鲁、樊纲.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 2004 (1): 33-44
 [3] 托马斯·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4] 郑新业、张阳阳、马本. 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新机制与新证据[J]. 经济研究, 2018 (8): 134-148
 [5] 李实.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四十年[J]. 北京: China Economist, 2018 (2): r33
 [6] 李实. 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J]. 管理世界, 2018 (12): 19-28
 [7] Adelman, I., Sunding, D. Economic Polic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87, 11(3): 444-461
 [8] Jaumotte, F., Lall, S., Papageorgiou, C.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Technology, or Trade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J]. Imf Economic Review, 2013, 61(2): 271-309
 [9] Riskin, Carl. China's Retreat from Equality[M]

(责任编辑: 冯天真)